

# 联绵词与单字词音近义同现象的思考

詹鄞鑫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上海 200062)

[摘要] 联绵词与单音节词有音近义同的现象,如“窟窿”和“孔”;“葫芦”和“瓠”;“辗转”和“展”。这是语言现象,但不能排除文字现象的可能性,即单个书写形式跟两个音节对应。上古文献中文字跟语言不对应的现象并不少见,这提示书面语以单字形式记录双音节词的可能性。除了联绵词单字形式的事实,一字的两读正好构成联绵词两个音节的奇特现象也暗示联绵词的单字记录形式,并透露出部分联绵词来源于复辅音声母的迹象。这对认识双音节词的演变以及早期汉字的性质,提出了新的思考。

[关键词] 联绵词;单字词;合文;复辅音声母

[中图分类号] H1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5)05-0150-07

双音节联绵词与单音节词有音近义同的现象。这里说的“音近”包含两个意思,一指两者之间具有语音上的联系,如“窟窿”快读为“孔”;一指单音节词跟双音节词中的一个音节相同,如“瓠”音同“葫芦”的“葫”。从语音的角度说,这是一种语言现象,但许多迹象表明,不能排除文字现象的可能。假设“瓠”字起初的读音就如“葫芦”,那么“瓠”就不是单音节词,而只能叫做“单字词”,意思是用单个文字记录的词。假如一个书写单位跟两个音节对应,那就是文字现象了。本文意在揭示存在于上古书面语中的文字跟语言不对应的现象,以及若干奇特的一字两读或两谐现象,以探索联绵词跟单字词音近义同现象的本质。这有助于对上古时期可能存在复辅音声母、双音节单纯词的演变、早期汉字的性质等问题的认识。

—

在汉语中,联绵词是一种常见的词汇类型,它是由两个音节连缀而成的单词素复音词。联绵词的两个音节,往往有叠音或双声叠韵关系,即使没有双声叠韵关系者,也有可能蕴含着某种语音上的联系,即声相转或韵相近,或者两个音节的声母具有d-l、g-k、h-l之类关系<sup>①</sup>。

大凡谈联绵词,都会强调其单词素性质。联绵词不能拆开来理解,这应是训诂学常识。但例外现象并不罕见,如联绵词“麻木”可以单称“麻”或“木”;“战栗”可以单用“战”或“栗”<sup>②</sup>。

对于联绵词的拆用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一种做法是对它的单纯词性质提出质疑。白平先生曾分析“披靡、辟易、参差、辗转、窈窕、崔嵬、虺、栗烈、鬻发、从容、岂弟、匍匐、徘徊、薜荔、憔悴、婉孌、螭带、天阙、翱翔、逍遥、鸚鵡”等被今人明确指为单纯词的联绵词,认为它们都是字各有义

[收稿日期] 2005-04-1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 詹鄞鑫(1947-),男,福建建瓯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史和文字学研究。

① 本文出现的拟音不多,为了简化,采用汉语拼音字母。当用于记录方言时,只是近似地拟音。

② 书证常见,此不赘述,参看《汉语大字典》等工具书。

的复合式词语。以“辗转”为例《诗经·周南·关雎》“辗转反侧”，郑玄笺：“卧而不周曰辗。《释文》：“辗，本亦作展。《说文》：“展，转也。《玉篇》：“辗，转也。”据此他判定“辗转”是一个同义并列结构的复合词语（11 p.179）。

笔者以为，白平的论证是值得商榷的。假设“展”和“辗转”同义，就如“瓠”和“葫芦”同义一样，那么，是否就表明“辗转”、“葫芦”一定是复合式词语？换言之，如果承认“辗转”、“葫芦”等联绵词的存在，那么，是否就不允许语言中同时还存在一个音义与之相近的单音节词？如果这个问题是需要讨论的，那么，“展”和“辗转”同义的现象就还不足以成为否定“辗转”是联绵词的理由。

语言现象其实是很复杂的。根据从母语方言词获得的感悟，笔者认为语言中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个单音节的语词还具有一个与之有语音联系的双音节乃至多音节的同义词（不排除修辞色彩的不同）。那么，对于上述联绵词可拆用的现象，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与其看成是联绵词拆开用，还不如看成是联绵词与另一个有语音联系的单音节词同义的现象。

联绵词的出现，本是语言中的自然现象，只要语音上有联系，其音节的多寡往往具有灵活性。例如，现代汉语可以把凌乱状态叫做“乱”，也可以叫做“凌乱”，也可以叫做“乱糟糟”，或者“乱七八糟”，这些同义词的音节从一个到四个都有，其书面形式都包含了一个“乱”字，而跟“凌”、“糟”、“七八”等音节独立成词的词义无关。在方言词汇中，音节变化的现象尤其普遍。以闽北建瓯方言为例，“爬”土语叫“ba（音近于“巴”），还叫作“bala（巴拉），成为叠韵联绵词。“角落”叫“gulu（角用）”，还叫“gulutia”，变成三音节词，也以单音节的形式跟其他词搭配使用，如“墙角”、“箱角”；“角”音如“gu”，义为角落。“滑”音如“gui”，还叫作“laligui（拉利滑），也变成三个音节。至于把“啰嗦”叫作“啰里啰嗦”；“糊涂”叫做“糊里糊涂”，就都转变成四个音节。在日常口语中，语词增加音节的模式是多样的，有的是单音词与同义多音词的关系，如：浑—浑沦，蒙—朦胧，迷—迷离，猪—猪猡；有重叠发音变成的，如：马虎—马马虎虎，迷糊—迷迷糊糊，邋遢—邋遢邋遢；有的是联绵词前一音节重复再缀加音节“里”而变成四音节词，如：邋遢—邋里邋遢，古怪—古里古怪；有的是联绵词两个音节各缀加一个音节，如：鬍发（吡叭）—吡里叭啦，蟋蟀—蟋里蟀噜。这些变化都是音节性的，没有增加有意义的词素。音节变化之后词义大多不变，而色彩发生微妙的变化。

这类现象在许多方言中都有，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联绵词跟其中一个音节独立构成的词同义的道理。同联绵词中双声词或叠韵词的语音联系相比，联绵词音节多寡变化的现象更显示出联绵词的俚俗性质，颇值得注意。

联绵词拆用的现象早已被研究者所注意，有些例子屡屡被相关论著提到，如《诗经》的“何草不黄”、“何草不玄”是“玄黄”的拆用；《老子》的“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是“犹豫”的拆用（21 p.29）。至于联绵词跟某个有语音联系的单音节词同义的现象，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被研究上古复辅音问题的学者所关注。林语堂把叠韵词的音变当作上古曾有复辅音的证据之一，他引述了许多叠韵词音变例：孔—窟窿—孔窠，团—突栾—团栾，顶—滴领—顶领，螳—突朗—螳螂，角—斫落（即角落），圈—窟挛，錧—錧辘，笔—不律，狸—不来，风—孛缆，蒲—勃卢，秃—秃驴，等等。他还进一步从古音的角度来分析这种现象，例如分析“狸—不来”的语音关系时说：

“狸之言不来也”《仪礼·大射仪》奏狸首”郑注。《方言》（卷八）：“狸，北燕、朝鲜之间谓之狸（字从否），关西谓狸。”郭璞注：“今江南呼为狸狸，音丕。”聚珍版《方言》戴东原按：“狸狸转语为不来。”堂按：郑说狸之言不来，最能使我们明白古时“狸”字的呼音。谐声上最奇怪的现象就是狸字由里得声，而兼有鬚、虀二音，虀（古埋字），鬚也同是埋音，狸字也有鬚、虀二音，此li，ba（埋，厦音bai）引者注，厦指厦门二音互相孳乳的关系应当如何解释？有人以为狸的埋音非得声于里。但既然如此，第一，何以同一字而有两音？第二，何以古时里字也有借作埋字用？（《庄子·则阳》“灵公夺而里之”《释文》：“里，本作埋。”）第三，更奇怪的，何以无论狸字读为鬚音，或

是读为埋音,俱有埋伏、埋藏的意义。可见得 li、bai 二音的关系,并不是全出偶然的。<sup>[3] p.18)</sup>

还有学者提到:“在古汉语中,许多双声叠韵的联绵词都可看作是由单音节词延长声母或韵母而形成的。如:须—斯须,勉—黽勉,漫—弥漫,离—流离,糜—离糜,婉—委婉,茫—迷茫,螻—螻螻,蛛—蛛蛛(以上双声);迷—迷离,般—般桓,婉—婉奕,蒙—蒙戎,童—童蒙,嵯—嵯峨,猗—猗猗,茫—茫羊(以上叠韵)。”<sup>[4] p.44)</sup>究竟是单音节词音节增加成联绵词,还是联绵词音节简略为单音节词,这是可以讨论的,但具有音近义同关系的单音词与联绵词同源则是无疑的。

## 二

然而,问题可能还有更复杂的一面,因为古汉语中的词汇是通过文字记载保存下来的,而文字记载却不见得跟语言是完全一致的。林语堂在说到上古复辅音问题时曾感叹道:“因为中国文字素来非用字母拼音,所以就使古时果有复辅音,也必不易直接由字形看出来(譬如用罗马字母拼音便可一目了然,无待详辨)。”<sup>[3] p.14)</sup>要从书面文字看上古汉语,有必要注意到上古书面语跟口语不一致(这里指书写单位跟音节不一致)的一面。

甲骨文中有一些文字书写形式显然跟当时的语言是不对应的,这点主要反映在习见的合文现象上。合文,即把两个(或更多)字合成一体书写,形式上是一个字,实际上应该读两个(或更多)音节,这两个音节表达的是两个词或词素,词或词素之间的结构关系有的是个数修饰十百千万等大数,例如“五十”、“三万”;有的是数词修饰名词,例如“三牛”、“五十朋”;有的是专门名称,例如月份名“二月”、“十二月”,或先王神主名,例如“上甲”、“雍己”、“祖乙”、“妣辛”;有的是形容词修饰名词,例如“小臣”、“小雨”;有的是副词修饰动词,例如“不雨”、“允雨”;有的是动词带名词宾语,例如“亡风”、“亡雨”;有的是并列名词,例如“风雨”、“丙寅”<sup>[5] pp.65-67)</sup>。合文现象在东汉以后就很少见了,但至今也没有完全消失。现代汉字中把“千瓦”写作“仟”;“千克”写作“仟”;“海里”写作“浬”;“图书馆”写作“圖”,这些都是合文现象。民间符部文还屡见“黄金万两”、“招财进宝”的合文形式。可见,商代文字形式跟音节的一一对应关系还没有成为一种必然,书写形式在很多场合下是跟思维相对应的。例如月名和神主名都是专有称号,不论几个音节,习惯上就写成一个字。当然,在甲骨文中,合文并不是必然的形式,凡可以写成合文的短语或名称,也都存在一字一音分开书写的形式。虽然在总体上说,一字一音已经成为甲骨文的主流,但在有的场合下(如数词和月名等的表达方式),合文还处于主流的状态。

甲骨文中还有一种更加隐蔽的合文形式,表面上看跟形声字很相似。甲骨文表示牡畜的“牡”、“郟”、“邢”和表示牝畜的“牝”、“郎”、“𠂔”等字,今人分别释为“牡”和“牝”。然而,甲骨文“牡”只表示牡牛,而不表示牡羊、牡豕,“郎”只表示牝羊,而不表示牝牛、牝豕,余可类推。那么,如果不管字形从牛从羊从豕,一概释为“牡”和“牝”,对于“眼看”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偏旁不同可提示牛羊豕的区别;但对于“耳听”,“牡”和“郟”的读音如果一样,就无法确切地明白其意思。按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我们很难想像商代的文字只能看懂而不能听懂。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书面的“牡”字对应的不是语言中的“牡”,而是语言中的“牡牛”;同样,“郟”字对应的是语言中的“牡羊”,其余类推。甲骨文中还有一个兼表牝牛和牡牛意义的“郎”字,其含义应该是一牡牛和一牝牛合成一对,不论怎么读,这个字包含三个语素,至少对应三个音节(少一个音节就不能完全听懂)<sup>[5] p.228)</sup>。所以,甲骨文中“牡”、“郟”等字,不论是否算合文,它们跟语言的不对应关系却是难以排除的。

早期的合文现象是文字原始状态的遗存。原始文字的特点,就是文字形式更加着眼于意义,而不是语音,更加直接地表达思维,而不是语言。按照西方的文字学理论,最原始的文字是“图画文

字”，它不反映语言的形式。在成熟的文字体系中，书写单位所对应的语言要素有的是词，有的是词素，有的是音节，有的是音素，它们被认为代表着不同的文字发展阶段。前苏联文字学家伊斯特林沿用西人的说法将此视为一种规律。他说：“从总的历史方面来看，文字的发展是从偶然的图画文字的图形到经过整理的、但又是复杂的表词文字体系，然后再由后者发展为更简单的词素文字体系，以及（特别是）音节文字和字母—音素文字体系……文字发展的特点（从总的历史方面来看）就是连续不断地向表示语言愈来愈小的要素过渡。”（[1] 61 p.550）对于表意体系的汉字而言，从表词发展到表词素应该是一种进步。甲骨文仅就合文的性质而言，则还没有实现完全跟词的对应，其中有些是跟词组或短语相对应，而且显然不能跟音节对应。这种现象是甲骨文中跟语言形式脱节的原始形式的遗迹。

由此可知，在上古文字资料中，不能肯定一个字的形式一定只代表一个音节，在并不少见的情况下，一个文字书写单位可能代表两个（或更多）音节。传世上古文献因其文字经过整理，不再出现合文和重文符号，文字跟音节的对应情况表面上是一致的。但隐情难明，也可能还藏有不对应的情况，如用“诸”“记”之于“或”之乎”；“叵”“记”不可”之类。类似情况并不罕见，只是因为汉字的非拼音性质，缺乏判断标志，于是就被掩盖了。双音节单纯词跟单音节单纯词音近义同的现象，随着20世纪对复辅音问题的关注，才重新浮出水面。

即使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除了上面列举的合文之外，也还存在书写单位跟音节不一致的现象，明显的表现就是儿化音的记写方式——把单音节性质的儿化音写成两个汉字。例如把口语的“花”（huar）记写为“花儿”（北京以外地区的读者往往按字面读为两个音节的huaer）。这种现象提示我们，由于慢读或复辅音音节而记写成两个字，从而转变为双音节联绵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从语言发生的角度看，由于上古复辅音现象的影响，早期汉语中的联绵词一定也是比较丰富的，这点可以从《诗经》和《楚辞》中还保存着丰富多彩的联绵词获得证实，也可以从方俗土语中存在大量的联绵词获得印证。由于联绵词的文字记录形式跟汉字单字表意的习惯不协调，越往后书面语中的联绵词就越少了（但在语言中一直是丰富的）。奇怪的是，在商周实物文字资料中，却未见联绵词的影子。原因之一就是有可能联绵词未能在文字形式中获得表现。

下面试从古书用字和读音现象揭示上古时期单字可能读如联绵词的痕迹：

### （一）葫芦—瓠、卢

“葫芦”为叠韵联绵词，在古书中还有多种写法，如：觚卢（《汉书·司马相如传·子虚赋》）、瓠瓠（《玉篇》）、壶卢（《世说新语·简傲》），字异而音义同。

笔者曾探索“壶”的语源，注意到早期的壶不论其外观还是功能都源于对葫芦的仿制，可知“壶”得名于“瓠”（[5] p.221）。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作为饮器的壶在古代既称为“壶”，又称为“瓠（卢）”（瓠、瓠）作为瓜果的葫芦同样既称为“壶（瓠）”，又称为“瓠（瓠）”。

壶称“瓠（卢）”《说文·缶部》作“郭（与皿部“瓠（卢）”实为一字），籀文作“瓠（瓠）”，释为“瓠也”。瓠（音垂）《说文·缶部》：“小口罍也。”罍是腹大口小的陶瓶，与葫芦瓶造型正合。《篇海类编·器用类·缶部》：“瓠，罍也，酒器。《集韵》：“郭，籀作瓠，亦从瓦。”字从瓦为“瓠”《玉篇》、《广韵》

① 对于这种所谓“规律”笔者并不完全同意。笔者以为，表词或词素跟表音节或音素是两种不同的方式，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并不是互相排斥和对立的。以汉字为例，现代汉字的每个书写单位所对应的既是词或词素，同时也是音节。表词或词素着眼于意义，表音节或音素着眼于读音，这是文字记写语言的两大法则。它们的不同主要是由语言特点所决定的，两者之间不存在发展阶段高级或低级的问题。

并云：“觚，酒器。《汉书·司马相如传》文君当卢”注引郭璞：“卢，酒卢。”汉代的“卢”虽为酒器，但其外形大概已经跟壶不一样了。



葫芦称“壶”《诗·豳风·七月》：“八月断壶。”毛传：“壶，瓠也。”又称“庐”《诗·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有学者考释，文中“庐”、“瓜”对文，生于田中，可剥可菹，献祭于祖，当解为“觚卢”之“卢”，即葫芦，字也作“邇（卢）”。《易·剥》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卢。”此“卢”也当作葫芦解<sup>71 p.228</sup>。“卢”加类化偏旁则为“觚”《玉篇》：“觚，瓠瓠也。”

作为瓜类的葫芦（古写作“壶卢”）既可以单称为“壶”或“卢”，那么，作为饮器的“壶”或“卢”，也应由“壶卢”这个联绵词转化成的。进一步看，则《诗》、《易》等早期文献中表示葫芦义的“壶”和“卢”，其读音有可能来源于复辅音读法，即类似“壶卢”快读这样的音。从形声字的谐声情况看《广韵·模韵》“乎”音同“胡”，卢吴切，而从“乎”得声的“耶”音“卢”，落胡切。类似 h-l 或 g-l 声母转变的还如：从“各”得声的“貉”为晓母字，而“路、赂、烙、洛、落、珞、络、酪、砾、骆”等均为来母字；从“果”得声的“夥”为晓母字，而“羸、裸、保”等均为来母字。又从“卢”声的字俗书也写作从“户”，如“鲈”《正字通》云“俗鲈字”，则“户”字有与“卢”相近的读音。

## （二）昆仑—昆、仑

跟“葫芦”单称为“壶”或“卢”的现象相似，“昆仑”单称为“昆”是联绵词写成单字形式的又一典型之例。古书在提美玉产地时《书·胤征》、《吕氏春秋·重己》均举“崑山”《史记·李斯传》作“昆冈”，张守节《正义》以为即昆仑山，是“昆仑”可单写作“昆”。有迹象表明，“昆”、“浑”等单字词起初有可能读为双音节，即“昆”应读为“昆仑”。试看字书中以“昆”或“仑”为声符的形声字，有些兼有见母（g）、晓母（h）与来母（l）两读。如“鄘”异体作“癯”，韵书载有三读：古本切（音袞）、胡本切（音混）、卢本切（音沦）；“沦”音龙春切（音伦），又音姑顽切（音鯨）；“纶”音伦，又音古顽切（音鯨），等等。这些字既读如“袞”或“混”，又读如“伦”，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它们曾读如“昆仑”，终因一字对应一音，所以只能从两个音节中选择其一：或读如“昆”，或读如“仑”，这两读正好构成一个联绵词。

## （三）龠—俎、宜

甲骨文和金文屡见的字，古文字学界已公认既是“俎”字，又是“宜”字（两释均有字形演变方面的强硬证据）。“俎”和“宜”的读音很不相同，令人疑惑。有趣的是，“俎宜”连读正好构成一个联绵词，这个联绵词是一个词族，其书写形式颇多，如“癩癩、岨岨、岨岨、龠龠、俎俎”等，音转而为“癩癩、嵯峨、嶮岩、作鄂、驹虞”等。它们虽义各有别，但都寓有锯齿状起伏不平或牙齿般交错摩擦的意思。其发音特点是：两个音节韵相近，声母关系总是“精—疑”二纽（z-ng）。看来，字的读音起初是双音节“俎宜”，代表一个联绵词。《说文》把“癩”字释为“癩癩”（即“癩癩”）。癩，《广韵》渠羁切，或鱼倚切，又渠羁切；龠，居御切，均与“癩癩”有音转关系。从词义看，王筠《说文释例》说“终疑癩为锯之古名也”，而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说“古之所谓癩癩，即今人所谓锯矣”。锯的特点是锯齿参差不齐，这种状态古人称为“龠龠”，由此可见，单音节的“锯”与双音节的“龠龠”有着同源关系。又古代有一种叫做“龠”的乐器，郭璞《尔雅·释乐》注：“龠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癩癩，刻以木，长尺栝之，龠者其名。”这是一种虎形木制乐器，背上有“癩癩”锯齿状木条，用木尺在锯齿上刮磨，就会发出特殊的声音，古人以此作为奏乐终止信号。可知“龠”得名于“癩癩”，与“锯”之得名正同。

#### (四)果裸—果、裸

果裸《说文》作“果𦵑”《尔雅·释草》作“果羸”。程瑶田、王国维都有关于“果羸”转语的论述。这已成为联绵词孳乳现象的典型例证。需要指出的是,形声字的谐声现象也透露出两者的语音关系。例如“果”读见母(g),果声的“裸、保、羸、搢”等均读来母(l),透露出上古时“果”可能读如“果裸”(g-l)。

陈独秀早年研究复声母,曾引述形声字谐声例和又音例来说明声母的这种关系。谐声字例如:洛、落、路、赂等均从各得声,裸从果得声,绀从咎得声,郟、穆、巘从𦵑得声,阑、癩(栏)、瘰(兰)、澜、澜从柬得声,隆从降得声,濫、篮、蓝、览从监得声,殄、脸、敛从金得声,凉、谅、掠、晾、癩从京得声,莒从吕得声,廉从兼得声,逵从壺得声,隔从鬲得声,等等。又羹有“羹郟”二音。《左传·昭十一年》“楚子城陈蔡不羹”。《释文》:“羹旧音郟。”<sup>[1]</sup>按,见母和来母并不相近,这些字之所以有见母、来母两读,绝非因音近而通谐,而是它们本来就有两读,大概就像不少音韵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上古复辅音声母的遗留形式。许多联绵词声母为g-l关系,正是这种语音的双音节化形式。

#### (五)角落—角、落

联绵词“角落”,音转为“𦵑𦵑”,闽北建瓯方言叫“gulu”,若按方音字当写作“角用”(音似“谷鹿”)。按,上古“谷”字有“谷鹿”二音。《史记·匈奴传》“左右谷蠡王”《集解》引服虔曰:“谷音鹿。”“角”、“用”本为一字。《广韵》屋韵“角”音“禄”。注:“角里先生,汉时四皓名,又音觉。”按,读如“禄”的“角”后来为区别之故而写作“用”。《通志·氏族略三》:“用氏,亦作用里氏。汉初商山四皓有用里先生。”五声之一的“角”古或写作“郟”《玉篇·龠部》:“郟,东方音,今作角。”北魏江式《求撰集·古今文字表》:“(吕)忱弟静,别放(仿)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郟徵羽各为一篇。”也见《魏书·江式传》:“角”亦作“郟”。郟从龠录声,古岳切(音角),又卢谷切(音禄)。表示角落义的“角”经籍中又写作“绿”。《礼记·丧大记》:“君大夫髻爪实于绿中。”郑注:“绿当为角,声之误也。”孔颖达疏:“绿,即棺角也。”总之,“角”包含“觉”、“禄”二音,单字两读均有角落的意思,实即联绵词“角用”(角落)的单字记录形式。

以上所论,例证容或可商,但上古书面语中存在文字与语言不完全对应的现象是可以肯定的。从许多一字两读正好构成联绵词两个音节的现象来看,在文字与语言的不对应现象中,单个文字记录双音节词(尤其是联绵词)的情况也许是比较突出的。

此外,如果同意上古存在复辅音声母的假说,既然复辅音声母是联绵词的来源之一,那么,当它还处于复辅音发音的状态时,其读音仍应视为单音节的音,则本文中所说的双音节现象有些应属于单音节的复辅音现象。

#### [参 考 文 献]

- [1] 白平. 汉语史研究新说[M]. 太原: 书海出版社, 2002.  
 [2] 何九盈, 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讲读[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0.  
 [3] 林语堂. 古有复辅音说[A]. 赵秉璇, 竺家宁. 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C].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 14-24.

- [ 4 ] 严廷德. 古汉语词汇学 [ M ].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 [ 5 ] 詹鄞鑫. 汉字说略 [ M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 [ 6 ] [ 前苏联 ] B. A. 伊斯特林(左少兴译).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 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 7 ] 钱剑夫. 诗‘中田有庐’解新探 [ A ]. 吴文琪. 语言文字研究专辑 [ C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461 - 467.
- [ 8 ] 陈独秀. 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 [ A ]. 赵秉璇, 竺家宁. 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 [ C ].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 25 - 38.

[ 责任编辑 穹 旻 ]

## On Disyllabic Roots and One-character Free Morpheme Sharing Similar Sounds and Identical Meaning

ZHAN Yin-x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Centre for Chinese Script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 Abstract : A disyllabic root is defined as a free single-morpheme with two syllables that in turn are in two written forms represented by two Chinese characters. But documents show that some disyllabic roots are written as one single character without any change of meaning. Instances are “瓠” and “葫芦”, and “展” and “辗转”, in both of which the single-character forms and the two-character forms are of identical meaning. We take this as disyllabic roots sharing identical meaning with one-character free morphemes rather than, as some linguists believe, division of disyllabic roots into two single characters. This can be further indicated in that in some dialects there are some written forms that are of increased or reduced syllables without losing any meaning in their process of evolution. Yet, unmatchability of spoken forms and their equivalent written forms do exist, as in early documents we can see that not all single-character represent only one-syllable. Even today, we can still find some examples of this kind. This indicates a great possibility that disyllabic roots are evolved because of slower pronunciation of the two syllables or of consonant cluster being presented by two written forms. Disyllabic roots such as “葫芦”、“昆仑”、“龃龉”、“角落” have also equivalent one-character forms to represent. Furthermore, some ancient books on Chinese sounds and rhythms have examples of one character with two sounds that in turn are the two sounds of their equivalent disyllabic roots. Thus a possible reference is that as for unmatchability in spoken forms and their written forms, it is manifest that some one-character forms can represent two-character disyllabic roots.

**Key words :** disyllabic roots ; one-character ; free morpheme ; consonant cluster

本刊讯 2005年7月4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张洪明教授应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邀请,前来浙江大学作了题为《语音与语法的界面关系——山西平遥方言连读变调例证研究》的报告。张洪明教授现为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执行秘书长、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海外留学中心”中国部主任和东亚系“助教与研究生评估管理委员会”主席、南开大学客座教授,其研究领域涉及音系学理论、语音与语法的界面、历史语言学、方言学、对外汉语教学法、诗律学等多个方面。在报告中,张教授从短语音系学角度探讨了语音和语法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相关本质,并通过对山西平遥方言连读变调的研究,分析了相关流行理论的价值及其失误所在,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解释模型,探讨了语音和语法之间映射关系的本质特点。本刊编辑参加了此次报告会,并向张教授赠送了本刊刊物。